

## 论上海犹太难民从沉默到创伤宣称的过程

王美华\*

**【摘要】**与其他大屠杀幸存者一样,上海犹太难民也经历了从沉默到创伤宣称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相对缓慢曲折。其中社会文化情境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它在战后初期使难民记忆处于受压抑状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伤转向又间接唤醒了上海犹太难民记忆。此外,创伤回忆录的兴起也为其创伤宣称提供了有利场域,“后记忆”一代更是为其创伤言说和确立幸存者身份发挥了关键作用。上海犹太难民从沉默到创伤宣称的过程,不仅为其他边缘群体的记忆传递提供了思考,也道出了人类社会的共有责任。

**【关键词】**上海犹太难民;沉默;创伤宣称;文化创伤

### 前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犹太人遭遇纳粹大规模迫害,约2.5万名犹太难民相继前往中国上海避难<sup>①</sup>,战后陆续离开。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研究始于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专著出现,90年代起,对该领域的研究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呈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中国学者此时也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21世纪的上海犹太难民研究,总体上沿袭了之前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倾向多维度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中国学者对此贡献很多,如潘光、徐新、王健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上海犹太难民个体记忆开始被西方学者有意识地、系统性地加以收集整理,从亲历者视角回顾历史记忆,这一行动也凸显

\* 王美华,哈尔滨理工大学讲师。

<sup>①</sup> 参见潘光 Pan Guang、王健 Wang Jian 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 史述、理论与模式》[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1933-1945): History, Perspective and “Chinese Model”](上海 [Shanghai]: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38。

了个人故事对历史记忆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上海犹太难民研究多基于宏观视角,而大背景下的大屠杀记忆研究已越来越趋向于微观视角和证词方法论研究,如《证言:文学、心理分析和历史中的见证危机》(*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992)、《创伤:记忆探索》(*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1995)、《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1996)、《第一人称创伤:大屠杀期间的日记写作》(*Trauma in First Person: Diary Writing During the Holocaust*, 2017)等,都聚焦于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研究。国内学者,如乔国强<sup>①</sup>、陈俊松<sup>②</sup>、高晓倩<sup>③</sup>等人,则从文化记忆视角探讨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重构的关系,以及前者在文化记忆重构中的作用。

本文基于文化创伤理论,结合对上海犹太难民回忆录的文本分析,阐释二战结束近半个世纪后上海犹太难民从沉默走向创伤再现和创伤宣称的过程。塑造创伤过程,意味着上海犹太难民群体从缄默走向言说、从记忆的承载者转向记忆的传递者。通过讲述战争时期的个人生活故事和经历,集体创伤转向了个体化表征,它不仅在讲述曾经发生了什么,还呈现了受害者遭受的创伤影响,以及对创伤的追问。每个时代都有其创伤记忆,上海犹太难民对创伤记忆的宣称和言说,为当下和未来的人类社会如何避免创伤的历史性再现,展现了伦理责任和道德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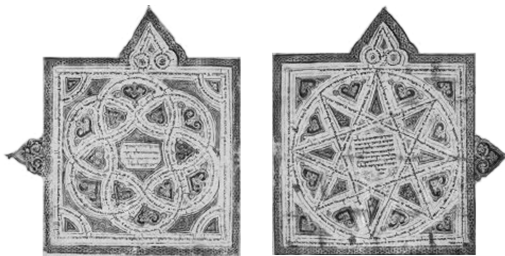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 一、沉默的上海犹太难民群体

二战结束以后的很多年里,大屠杀幸存者群体都处于一种缄默或半缄默状态,上海犹太难民群体更是如此,这不仅是社会文化情境压抑的结果,也是上海犹太难民幸存者的自主选择。即使当社会文化开始了创伤转向,上海犹太难民

<sup>①</sup> Qiao Guoqiang, "The Past Never Passes Away: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4.1 (2017): 107-124.

<sup>②</sup> Chen Junsong, "Jewish Settlement in Shanghai during WWII in Fiction and Other Media of Cultural Memory,"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19.1 (2021): 171-188.

<sup>③</sup> 高晓倩 Gao Xiaoqian,《上海犹太难民自传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策略》[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Strategies of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Autobiographies],于《人文杂志》[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2018年第4期[2018, Issue 4],69—77;《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中的犹太传统——兼论上海犹太难民自传的记忆结构》[Jewish Tra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Also on the Memory Structure of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Autobiographies],于《人文杂志》[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2020年第10期[2020, Issue 10],86—92。



亦很难在自身社群之外找到其他听众,更不用说获得认同。

战后大屠杀叙事沉浸在英雄叙事和对绝对胜利的宣扬中,间接导致了幸存者的缄默。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致力于战后秩序的重组与重建,对大屠杀也一如既往地沿袭其救赎叙事风格,在战后叙事中充分展示了民主对纳粹的胜利,宣扬纳粹主义已消亡,大屠杀终结,人类将继续前行并建设新世界,目的是宣扬反纳粹的胜利和进一步清除纳粹思想,对大屠杀创伤并不认同,认为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sup>①</sup> 总体来说,战后世界沉浸在民主胜利和对未来的建设中。尤其是战后移民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里,他们都处于一种缄默状态,试图忘掉创伤,以战后生活里的早期积极经历替代旧的记忆。这一时期的沉默被认为是“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研究缺失”<sup>②</sup>所致,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战后的上海犹太难民群体。

但是从幸存者角度而言,沉默也是群体内部自我审视和保护家庭的结果。大屠杀历史学家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指出,“极端形式的人类苦难是不可比拟的”<sup>③</sup>,并对“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将上海犹太难民排除在外,认为他们不会经历如此极端的苦难。在严格的“大屠杀幸存者”定义的影响下,犹太难民自我感知和扩大的“苦难等级”阻止了许多幸存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要么不认为自己经历过屠杀,要么认为自身经历无法与那些受苦难等级更高的人(如集中营幸存者)相比。<sup>④</sup> 如格里·林登施特劳斯(Gerry Lindenstrauss)描述了在上海“水沟里的死婴多么常见”,同时又指出他们幸运地逃离了大屠杀;杰里·布鲁尔(Jerry Breur)将 1943 年后的上海生活称为“饥饿的岁月”,但同时表示,他所遭受的痛苦与集中营里的囚犯无法相提并论;洛特·马库斯(Lotte Marcus)则直白地说:“我们内疚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毒气熏死。”<sup>⑤</sup>可以看出,这种

① Jeffery C. Alexander,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 — The Holocaust from War Crime to Trauma Drama,” in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eds. Jeffer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h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and Piotr Sztompk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09.

② David Cesarani, “Introduction,” in *After the Holocaust: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Silence*, eds. David Cesarani and Eric J. Sundquist (London: Routledge, 2012), 1.

③ Yehuda Bauer, *Rethinking the Holocau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

④ Yael Danieli, “Families of Survivors of the Nazi Holocaust: Some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in *Stress and Anxiety*, Vol. 8, eds. Charles D. Spielberger, Irwin G. Sarason and N. A. Milgram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1982), 405-421.

⑤ 转引自 Gabrielle Abram, “Ephemeral Memories, Eternal Traumas and Evolving Classifications: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and Debates about Defining a Holocaust Survivor,” in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Shanghai*, ed. Steve Hochstadt (New York: Touro University Press, 2019), 219-220.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对“苦难等级”的感知干扰了他们的自我认知,使他们自认为上海经历不值得一提。年长的幸存者保持沉默,是为了防止将创伤传递给子女。经历过创伤和失去亲人痛苦的他们,对子女有强烈的保护欲。朱迪·比彻(Judy Becher)的父母很少和孩子们谈论他们在上海的经历。当他们彼此谈论上海经历时,都是用上海话,为的是不让孩子知道这些往事;查亚·斯莫尔(Chaya Small)说,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她对孩子常常过度保护,如果找不到孩子,她会被“吓坏”。<sup>①</sup>从幸存者角度而言,他们的沉默也是个体选择和内在驱动的结果。

幸存者沉默被打破的转折点出现在1961年艾希曼审判之后,它不仅使美国建构的大屠杀英雄叙事受到质疑,也使大屠杀叙事开始向创伤叙事转变。艾希曼审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年美国加入越南战争(1961—1973),成为另一起灾难的制造者和参与者,这无疑动摇了大屠杀救赎叙事建构的基础。随着美国越战老兵出现创伤神经症状,创伤研究开始在美国受到重视,开启了当代创伤研究的新起点。1981年,耶鲁大学教授多里·劳布(Dori Laub)和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主持的大屠杀幸存者视频档案工程(Video Archive for Holocaust Testimony)引发了创伤记忆研究的热潮。此后“创伤一跃成为西方公共政治话语、人文批判关怀乃至历史文化认知的流行范式”<sup>②</sup>。与救赎叙事不同,创伤叙事不存在救赎,它主张悲剧的永恒再现,反对呼吁结束。杰弗里·哈特曼在其著作中说:“大屠杀事件不能被归为过去,它们还没有结束……要退回历史,拒绝乐观,找到一种方法,使后人能回想起这场灾难的深重程度。”<sup>③</sup>大屠杀创伤叙事就是要建构这样一种情节:受难者被强大的、难以理解的力量控制,无助感弥漫在整个叙事中,唤起观众的怜悯体验。其目的是迫使观众一次次地重返悲剧,从中体验受害者的无助,由此,原始灾难性事件被演绎成一出创伤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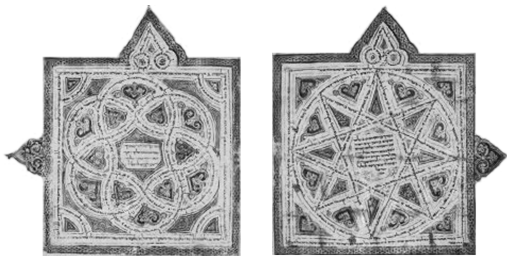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大屠杀创伤剧的建构依赖于幸存者证词,但上海犹太难民的证词很难被认同。虽然艾希曼审判之后的时期被称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年代”,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前难民们依然处于被缄默状态,因为他们并不被大屠杀研究机

---

① 转引自 Gabrielle Abram, “Ephemeral Memories, Eternal Traumas and Evolving Classifications: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and Debates about Defining a Holocaust Survivor,” 219-220.

② 陶家俊 Tao Jiajun, 《创伤》[Trauma], 于《外国文学》[Foreign Literature], 2011年第4期[2011, Issue 4], 117.

③ Geoffrey H. Hartman, *The Longest Shadow: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5.



构认可。<sup>①</sup> 伴随六七十年代第一代大屠杀幸存者的逝去，“儿童幸存者”一代于80年代登上了历史见证的舞台。多元文化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兴起，使上海犹太难民获得了去社区、学校等机构讲述上海经历的机会，但他们的证词并未得到广泛的、正式的认可。虽然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基金会在20世纪90年代确曾收集过上海犹太难民证词，但一些人抱怨这些采访针对的是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样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提问结构难以包容上海犹太难民证词。上海犹太难民、美国犹太活动家伊芙琳·派克·鲁宾(Evelyn Pike Rubin)也认为大屠杀基金会的采访者“没有问正确的问题”<sup>②</sup>。这说明，上海犹太难民作为一个集体，在犹太难民社群以外很难找到听众，虽然上海犹太难民人数是被解救犹太人的两倍，但他们的证词并不被认为在大屠杀记忆中有重要意义。

外在社会文化情境的压抑是部分原因，即使社会文化发生了转向，由救赎叙事向创伤叙事转变，犹太难民群体依然处于沉默或半沉默状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七八十年代的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去分享，却找不到听众，而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也很快就谴责他们的回忆是不真实的。还有部分原因是上海犹太难民对苦难等级的自我评定和对下一代的呵护。可以说，上海犹太难民在战后长达三四十年的缄默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二、难民回忆录与创伤潮流的契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创伤研究引发热潮，直接促进了难民回忆录的兴起，90年代以后上海犹太难民回忆录的涌现正好与西方社会文化的潮流相契合。这一时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文化创伤理论，它认为大屠杀创伤属于一种文化建构，而上海犹太难民群体要想在自身社群外获得认同，也必须符合这种文化建构模式。它不仅要呈现群体的创伤宣称，还要有广泛的受众和可接受的社会情境。上海犹太难民正是借助回忆录这一见证文学形式，通过对难民集体创伤进行个体化表达，来获得认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大屠杀创伤记忆的研究“激起了一种跨学科的回  
应……打开了一系列包括心理分析、历史、临床、人类学和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回

<sup>①</sup> E. J. Sundquist, “Silence Reconsidered,” in *After the Holocaust: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Silence*, 202.

<sup>②</sup> 转引自 Gabrielle Abram, “Ephemeral Memories, Eternal Traumas and Evolving Classifications: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and Debates about Defining a Holocaust Survivor,” 221-222.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应”<sup>①</sup>。为什么它会引发研究热潮,引起跨学科的关注度?这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必然性,它或许表明创伤与我们当下的世界仍然密切相关。创伤的源头是现代性暴力,它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仍在继续,对创伤的研究实则是在努力搭建现在与过去的联系,重建过去的记忆,也为当下寻找新的出路。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的文化创伤理论就是在这种社会需求下被建构起来的。日常观念里,“创伤”被认定由具有创伤性的事件所导致,并最终影响了集体认同,这是由于个人安全与期望被寄托于“集体在物质或行为意义上的稳固”<sup>②</sup>,例如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爱、联结等遭到严重破坏时,人类就会蒙受创伤。《国族创伤与集体记忆:美国世纪的重大事件》(*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Major Event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一书的作者在解释集体是否蒙受创伤时,也将其指向了事件本身的性质,认为“非比寻常的事件”才拥有“爆发性的特质”,造成“断裂”和“剧烈变化”。<sup>③</sup>这种自然的创伤反应机制与个人心理创伤的神经症状<sup>④</sup>非常相似,结果都偏向于外部损害性事件造成了内在的创伤反应。但在杰弗里·亚历山大看来,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创伤性,创伤“是社会中介的属性”,它可以是“一种预示”,也可以是一种“事后的重构”。<sup>⑤</sup>进而,他从理论上区别了“社会”与“文化”的不同属性,认为“社会”从属于事实层面,“文化”从属于意义系统,即使“社会经验到大规模断裂……对受影响的集体成员而言是非创伤性的,更别提对整个社会而言了”<sup>⑥</sup>。战争和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开始从社会历史转向了文化历史,这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在塑造文化创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杰弗里·亚历山大不仅对灾难事件导致集体创伤的自然主义谬误提出了批判,还建构了一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文化创伤”理论。他认为创伤要在集体层面出现,必须使社会危机转变成文化危机,也就是说使创伤从社会系统走

---

① Kathryn Robson, “Curative Fictions: The ‘Narrative Cure’ in Judith Herman’s *Trauma and Recovery* and Chantal Chawaf’s *Le Manteau Noir*,” *Cultural Values* 5.1(2001): 115-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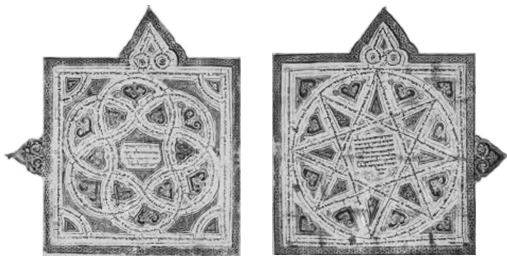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②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eds. Jeffer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h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and Piotr Sztompk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0.

③ Arthur G. Neil, *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Major Event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8), 3, 9-10.

④ 弗洛伊德最早意识到创伤具有延迟性,并提出了“早期创伤—防御机制—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内容的部分再现”的神经症发展模式。参见 Freud Sigmund, *Moses and Monotheism*, trans. Katherine Jones (New York: Vintage, 1939), 117.

⑤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8.

⑥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10.



向文化系统。因为社会事件是否具有“伤害”性,即创伤,依赖于特殊的文化一意义系统,它提供了特定的理解-阐释结构,用来反思事件带来的危机和社会意义。这种反思就是“尖锐的不舒服进入集体自身的认同感核心的结果”<sup>①</sup>。所以事件发生时,它无法被普遍经验为“创伤”,只有处于特定的文化一意义系统后才能被完全理解。创伤通常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很长时间才得以构建,不同于个体对创伤的压抑及否认的心理防御机制,集体创伤是通过集体的文化阐释过程,象征性地建构和塑造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

依据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大屠杀创伤是一种文化建构,上海犹太难民欲走出沉默,进入大屠杀集体记忆,亦依赖于这样的文化建构。它不仅依靠承载群体的创伤宣称,还依靠受众和社会情境。他们首先要回答:到底发生了什么?谁遭受了创伤?谁导致了创伤和实际伤害?然后还要回答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与广大受众之间的联系。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对于集体创伤化过程来说很重要。对于这些问题,上海犹太难民在回忆录中通过对个体记忆进行重新归类、寻找与其他幸存者的相似经验,来建构“合适”的大屠杀记忆。

首先,上海犹太难民创伤的建构依赖于承载群体的宣称。随着第一代犹太难民的老去,回忆录撰写者多为上海犹太难民家庭成员,他们成了家庭记忆的承载者和“监护人”,并且拥有一个共同模式,即认同父母一代在战时上海的经历,并将这种记忆传播和传递下去。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伤记忆研究进入热潮期,欧美创伤回忆录也随之进入繁荣期,上海犹太难民回忆录的出版也与这种潮流相契合,促进了上海犹太难民记忆的传递。尽管90年代,倾听幸存者证词的大门仍没有向上海犹太难民敞开,但难民回忆录已从此时开始出版。90年代,约四部难民回忆录出版,21世纪后,伴随上海犹太难民成为学术热点,约十七八部难民回忆录又陆续出版。回忆录通过聚焦人物的叙事手法,试图从当代视角重新审视战争和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给幸存者带来的影响,重构战时上海犹太难民叙事。这是对上海犹太难民创伤的重塑,也是难民群体的创伤宣称。

其次,上海犹太难民创伤的建构还依赖于受众和社会情境。回顾战后半个世纪的大屠杀记忆历程,总体来说其呈现自上而下的特征,叙事方式由宏观到微观,叙事形式也从官方主导转到关注个体,究其原因,如吉莫尔(Leigh Gilmore)所言“如果没有近30年来社会政治运动使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都可以出版讲述

<sup>①</sup>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10.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自己经历的著作的话,时下回忆录的繁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sup>①</sup>。人们对创伤的关注,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的文化转向,90年代创伤已超越大屠杀创伤话语走进各个领域,它反映了“集体记忆的认知和解释框架如何影响个体的现实感和活动感”<sup>②</sup>。可以说,社会情境决定了创伤的文化分类是否得以稳定,创伤是否得以重塑。此外,难民回忆录还通过受众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一种见证文学,创伤回忆录为群体受难者发声,它使个体经验的灾难性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使其成为人类共享的经验,这能在最大程度上引起读者的共情,它“传送了单靠历史不再能给予我们的东西”<sup>③</sup>,为构建犹太集体认同奠定了广泛基础。杰弗里·亚历山大指出,“创伤过程进入大众媒体时,它获得了机会……经过中介的大众传播让创伤得到戏剧性的表达,让某些相互竞争的诠释,可以获得相对于其他诠释的庞大说服力”<sup>④</sup>。文学所拥有的广泛受众和快速流通的方式都使难民回忆录的影响力得以扩大,不同于上海犹太难民之前被收集的“不利”证词,以及在社区、学校等有限区域的演讲,上海犹太难民创伤回忆录的出现,既“激励作者所属共同体的人们,同时教导无知者了解社会的真实”<sup>⑤</sup>。“这些作者的创作见证了个人创伤如何转变为文化创伤……他们个人叙事的出版和被接受累积产生了集体叙事”<sup>⑥</sup>,这种集体叙事又成为整个犹太社群文化创伤的基础。

### 三、记忆承载者的创伤言说

作为上海犹太幸存者记忆的承载者,他们的记忆与大屠杀幸存者的集体记忆显然相悖,串联上海逃亡记忆与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关键是,寻找记忆并对记忆进行重新归类,使其符合大屠杀文化创伤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后记忆”一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帮助对记忆的重新归类实现了创伤言说。

---

① Leigh Gilmore, *The Limits of Autobiography: Trauma and Testimon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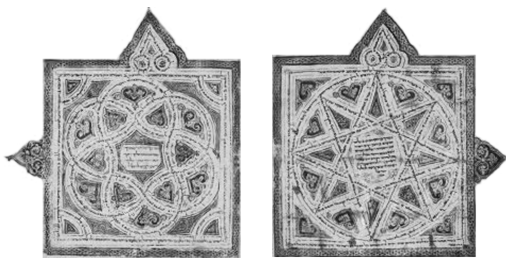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② T. Kirss, E. Kõreasaar and M. Lauristin eds., *She Who Remembers Survives: Interpreting Estonian Women's Post-Soviet Life Stories*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

③ Marianne Hirsch,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

④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18.

⑤ Sau-ling Cynthia Wong ed.,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 Casebook* (New York: Oxford, 1999), 37.

⑥ Karen P. Knutsen, *Reciprocal Haunting: Pat Barker's Regeneration Trilogy* (Münster: Waxmann Verlag GmbH, 2010), 55.



上海犹太难民记忆的承载者通常是上海避难时期的犹太青少年或犹太难民家庭成员,他们继承了第一代上海犹太难民的记忆,但这种记忆与大屠杀集体记忆相冲突。所以将记忆重新归类,使其嵌入大屠杀集体记忆是难民创伤宣称的第一步。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集中营,也少有纳粹迫害,更多的则是对上海的记忆,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大屠杀面前上海苦难不值得一提。如何从沉默走向言说?如何从上海的幸存经历走向大屠杀创伤剧?耶胡达·鲍尔认为,应对创伤事件的唯一方式是将大屠杀编织进他们自己的历史事件里。<sup>①</sup>找到与其他幸存者的相似经历,是上海犹太难民获得认可和归属感的基础。既然大屠杀集体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那对记忆的重新归类就不得不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谁遭受了创伤?谁导致了创伤和实际伤害?这些故事和经历与广大受众有什么联系?回答这些问题对再现创伤事件和塑造创伤过程至关重要。

首先,对刚到达上海时的犹太青少年来说,他们早期的记忆是零散和混乱的,既不能用来证明事实,也无法作为重现创伤事件的唯一来源,所以寻找记忆和对记忆重新定位是将上海犹太难民记忆进行重新归类的关键环节。曾经的犹太青少年到达上海时年龄都不到20岁,相当多的人年龄非常小,他们与第一代或年长上海犹太难民的记忆也不同步。年龄和异域经历导致了压抑的、碎片化的和消逝的记忆。幸运的是,移民后的大屠杀教育为他们提供了二战和大屠杀的历史事件和背景教育,这使他们能够将自身上海经历与纳粹迫害串联到一起,形成记忆上的连续性。

但是,纳粹迫害关键记忆的凌乱和缺失使创伤记忆的重新归类变得困难。如1939年11月9—10日(“碎玻璃之夜”)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迫害是上海难民和其他大屠杀幸存者共享的最后记忆,是创伤归类的关键,但很多人在此之前就已逃离德国或奥地利。1938年10月30日,13岁的霍斯特·艾斯菲尔德(Horst Eisfelder)跟随家人从柏林去往上海,于迫害前离开<sup>②</sup>;5岁的韦纳尔·格拉斯(Werner Glass)早在1933年就到达上海。<sup>③</sup>事实上,绝大多数难民都在此之前到达上海,去往上海的难民“到1939年6月至8月达到高峰,当时的难民总数接近1.4万名……阻止了上海的犹太难民人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超过1.7万

<sup>①</sup> Yehuda Bauer, *Rethinking the Holocaust*, Ⅲ.

<sup>②</sup> Horst Peter Eisfelder, *Chinese Exile: My Years in Shanghai and Nanking* (Melbourne: Ayotaynu Foundation, 2003).

<sup>③</sup> Werner Glass, “Interview by Gratz College Hebrew Education Society, Philadelphia, PA, April 7, 1992,” Accessed May 8, 2020, <https://collections.ushmm.org/search/catalog/irn508724>.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名。这场战争爆发后,所有向上海的移民都停止了”<sup>①</sup>。所以大多数难民可能是在迫害开始以前就去往上海,对于年龄较小的跟随者来说,对纳粹迫害的记忆相当模糊甚至缺失。

但作为将上海创伤归类的关键点,他们必须重新回顾这些零散的、模糊的记忆,以使其形成合乎逻辑的重新定位的记忆,但同时说明这些记忆并不是捏造的或想象出来的。哈里·卡茨(Harry Katz)回忆了6岁时看到的“楼梯顶上的一双大黑靴子”,以及他母亲的恐惧反应。虽然他对这段记忆发生的背景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穿黑靴子的人是谁,只记得他的6岁生日聚会被迫取消,但后来他从母亲那儿确认了这段记忆,将其与纳粹迫害联系起来;还有埃利·格拉斯(Elie Grasse)9岁时在街上被人喊“肮脏的犹太人”<sup>②</sup>;欧内斯特·库尔曼(Ernest Culman)看到从集中营释放的父亲哭泣;阿尔弗雷德·科恩(Alfred Kohn)放学路上听人大喊“打死犹太人”;埃里克·赖斯曼(Eric Reisman)的弟弟目睹班上的犹太小孩被人从顶楼扔下<sup>③</sup>;学校老师禁止犹太学生唱母亲节赞歌<sup>④</sup>;西格蒙德·托拜厄斯(Sigmund Tobias)是少有的对关键迫害事件有清晰记忆的儿童:

我们把公寓里的窗帘全部拉上,也不开灯……父母告诉我要尽可能保持安静;我们穿着袜子踮着脚尖走路,不用流动的水,也不用刀叉或盘子。我母亲准备了一天的三明治还有几杯牛奶和水放在桌子上。我强迫自己吞下几口三明治,但这让我很疼,因为我的喉咙很干,我想告诉她,但母亲把手指放在唇上示意我不要出声。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床上,只在必要的时候起来。那天过得很慢,寂静和黑暗里,我们时不时地被楼下街道传来的玻璃破碎的声音吓得惊恐万分。<sup>⑤</sup>

他们对各自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子都有模糊的记忆,但他们在重新审视这些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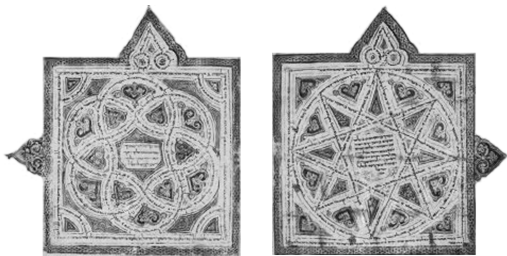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戴维·克兰茨勒 David Kranzler,《上海犹太难民社区》[Japanese, Nas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 许步曾 Xu Buzeng 译(上海[Shanghai]: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44。

② 转引自 Gabrielle Abram, “Ephemeral Memories, Eternal Traumas and Evolving Classifications: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and Debates about Defining a Holocaust Survivor,” 212。

③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 from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2, 25, 29。

④ Marion A. Kaplan, “Jewish Women in Nazi Germany: Daily Life, Daily Struggles, 1933-1939,” *Feminist Studies* 16.3 (1990): 590。

⑤ 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2。



糊记忆的时候,都将自己置于大屠杀创伤记忆的框架内,对于事件发生时年龄尚小的他们来说,把这些记忆与大屠杀背景联系起来需要时间。他们的早期记忆与上海记忆不一致,因此必须在其中添加一个明显的迫害时间线,使之进入二战和大屠杀的政治时间里,使到达上海之前的记忆得以定位且合乎逻辑。

其次,绝大多数回忆录都屡次提到失去亲人和创伤记忆的重返,这也是上海犹太难民与其他大屠杀幸存者的共同经历。对大多数幸存者来说,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才得知失去的家人的消息,不管他们在上海的经历与其他幸存者有何种不同,失去亲人是他们与其他所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共有经历,这使他们能与其他的大屠杀幸存者产生共鸣。一般而言,创伤通常不能作自我呈现的主要叙事工具<sup>①</sup>,因为创伤具有延迟性,无法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立即被讲述,它需要较长的时间距离以及对后续发生事情的充分理解。<sup>②</sup>对于创伤的延迟性,当代创伤研究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是这样描述的:“创伤描述了一种突然的、灾难性的、无法承受的经历,对事件的反应经常表现为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现象出现了延迟、无法自控和重复。”<sup>③</sup>但在上海犹太难民回忆录中,创伤记忆的侵入、噩梦、闪回等时常出现在文本中,如西格蒙德·托拜厄斯讲述在营地的许多个夜晚,他都从噩梦中醒来,浑身被汗水浸透,依稀记得自己梦见了达豪集中营的场景<sup>④</sup>;布鲁诺即使在上海,也总梦见自己在集中营,半夜尖叫着惊醒<sup>⑤</sup>;欧内斯特·赫普纳(Ernest G. Heppner)说:“每年 11 月 9 日,也就是 11 月大屠杀纪念日,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就会浮现在我脑海里。”<sup>⑥</sup>奥托·施耐普(Otto Schnepf)说:“我想我永远也过不去这道心理障碍了。那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和被遗弃感,它被强烈地压抑着,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格。”<sup>⑦</sup>创伤记忆的重返,使上海犹太难民的境遇与集中营幸存者的境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联结,这对创伤过程塑造和表现上海犹太难民创伤起着重要作用。

<sup>①</sup> L. Gilmore, “Limit-Cases: Trauma,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Jurisdictions of Identity,” *Biography: Autobiography and Changing Identities* 24.1 (2001): 132.

<sup>②</sup> Aili Aarelaid-Tart, *Cultural Trauma and Life Stories* (Helsinki: Kikimora Publications, 2006), 69.

<sup>③</sup>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sup>④</sup> 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34.

<sup>⑤</sup> 潘光 Pan Guang、周国建 Zhou Guojian、周晓霞 Zhou Xiaoxia 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Jewish Refugees Memoirs: Their Experience in Wartime China*](北京[Beijing]:时事出版社[Current Affairs Press],2015),140。

<sup>⑥</sup> Ernest G. Heppner, *Shanghai Refugee: 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Ghetto*, Ⅲ.

<sup>⑦</sup> 转引自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 from the Third Reich*, 63。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在创伤言说的过程中,“后记忆”一代是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他们成为中枢的一代,既承担起了前代记忆的监护职责,又直面历史,将记忆传播并传递下去。后记忆理论是玛丽安·赫什(Marianne Hirsch)提出的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理论,探索了记忆是如何传递给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以及记忆传递如何有助于幸存者身份合法化。该理论同样适用于上海犹太难民。“后记忆”一代既可能是家庭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成员,也可能是家庭中的同代人,他们“不是通过回忆而是通过想象的投入和创造”<sup>①</sup>而与前代产生联系。相比他人,他们更加认可家族的创伤故事,如奥黛丽·弗里德曼·马库斯(Audrey Friedman Marcus)无意间读到丈夫生前的日记<sup>②</sup>,被他经历的上海苦难震撼到,于是决定将其出版,让更多人了解这段记忆;朱迪·比彻(Judy Becher)带着母亲回到上海,鼓励母亲去寻找那些慢慢消逝的记忆;大卫·索卡尔(David Sokal)作为上海犹太难民的儿子和孙子,协助父亲编纂并出版回忆录<sup>③</sup>;薇薇安·珍妮特·卡普兰(Vivian Jeanette Kaplan)将其父母在上海的苦难经历出版成书<sup>④</sup>。可以说,“后记忆”一代在重塑前代创伤故事和帮助确立身份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正如玛丽安·赫什所言:“家庭的语言是……一种比社交和公共演讲更直接、更坚决的表达形式。”<sup>⑤</sup>

## 结论

历经了几十年的沉默期,上海犹太难民群体最终成为最晚被确立的大屠杀幸存者,通过向博物馆、基金会和历史学家捐赠相关文件和追溯记忆,这些难民在美国拥有了纪念遗址,还在大屠杀图书馆中占有一席之地。从打破沉默到创伤宣称,再到获得认可,这其中的过程有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既有赖于社会文化的创伤转向,也借助了幸存者回忆录、创伤小说等见证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热潮,以及“后记忆”一代对上海逃亡难民创伤宣称的共同努力。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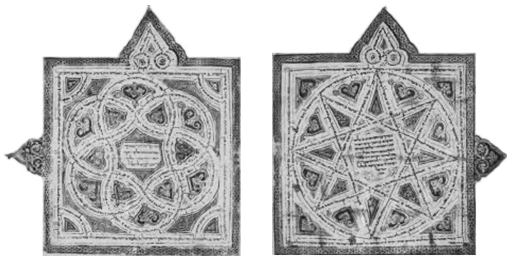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Marianne Hirsch, *Family Frames: Photography, Narrative, and Post-mem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

② 参见 Audrey Friedman Marcus and Rena Krasno, *Survival in Shanghai: The Journals of Fred Marcus 1939-49* (Berkeley, CA: Pacific View Press, 2008)。

③ 转引自 Gabrielle Abram, “Ephemeral Memories, Eternal Traumas and Evolving Classifications: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and Debates about Defining a Holocaust Survivor,” 228-229。

④ 参见 Vivian Jeanette Kaplan, *Ten Green Bottles: The True Story of One Family's Journey from War-Torn Austria to the Ghettos of Shangha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4)。

⑤ Marianne Hirsch,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112.



些都促成了上海犹太难民“大屠杀幸存者”身份的最后确立。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还有一些被压抑的边缘群体或处于沉默状态,或已带着不为人知的记忆消逝了,上海犹太难民幸存者身份的确立,或许可以为这些群体提供借鉴。那些限于小群体内的记忆或自传记忆,即扬·阿斯曼(Jan Assmann)定义的“交往记忆”,以40年为一个节点,经历一次记忆危机。如果没有及时转化为文化记忆,它们就会随着记忆承载者的死亡而逐渐消失。<sup>①</sup>所以,记忆要想长存,就必须成为文化记忆,也就是融入社会文化建构中,因为它提供了意义—阐释系统,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才能成其“意义”。

杰弗里·亚历山大说,文化创伤理论不是帮我们理解创伤悲剧性的缘由,而是理解其后续影响。探索上海犹太难民从沉默到创伤宣称过程的意义,也不是要探究上海犹太难民的创伤本身或其根源,而是它所指向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实践。在对集体认同不断修整重构的过程中,创伤建构“让集体得以界定新的道德责任形式,并且重新引导政治行动的历程”<sup>②</sup>。集体创伤不分地域也没有文化界限,人类社会需要共同承担这份责任,这是直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最好方式。

---

<sup>①</sup> 参见扬·阿斯曼 Jan Assmann,《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金寿福 Jin Shoufu、黄晓晨 Huang Xiaochen 译(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237。

<sup>②</sup>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27.